

日本江户时代
汉语研究论考

王雪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非外借

日本江户时代
汉语研究论考

王雪波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江户时代汉语研究论考 / 王雪波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1

ISBN 978 - 7 - 5201 - 5988 - 3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古汉语 - 研究 - 日本 -
江户时代 IV. ①H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11657 号

日本江户时代汉语研究论考

著 者 / 王雪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高 雁

文稿编辑 / 黄 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 5936722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3 千字

版 次 /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988 - 3

定 价 / 1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18 年度湖南文理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批号：18BSQD04)

前 言

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仅留下四个口岸对外交往。通过其中的长崎口岸，幕府和清朝政府间保持了长久的贸易往来。清船携入的物品种类丰富，书籍的输入量尤其大，使当时的日本拥有了刺激学术发展的外部条件。锁国政策虽然保守退步，却也在一定时期里屏退了外来武力的干扰，为日本社会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一时期，农业生产进步、手工业兴盛、交通发达、新兴商业城市增加，经济得到发展。在这样相对和平富庶的环境里，加上地方私学、出版印刷、抄本书籍等各方面的发展，学问开始由王室贵族向一般大众普及，庶民教育逐步兴起。不论文人学者还是一般的町人阶层，都通过汉籍获得了多方面丰富的知识，使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获得满足，汉语研究、学习的热情随之高涨。

江户之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而在江户之后日本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在战争政策的主导下，明治至昭和年间的汉语研究只是为了服务军事统治。因而只有江户时代出现了同时关注汉语口语白话和书面文言的情况，并且产生了众多研究专著。研究专著又能及时传播，对大众来说，发挥了汉语教育的作用。较之前代对汉籍文化的吸收，这一时期逐步出现了独立的语言研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对象涵盖全面。汉语白话和书面文言在这一时期都得

到了日本学者的专门探讨，文献中的方俗俚语也被提炼出来，整理成书供人参考查阅。口语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唐话教本中，是为培养学习者掌握交际能力而编写的汉语口语教材，其中选编了丰富的词汇、语句、段落。文言研究是对文言词语的分组释义，从古籍经典中选取包含待释词的语句用来例证词义，辅以我国的字书、韵书注释字音、字意，再以日语标注意义用法。以对文言虚词的释义为例，从单、复音文言虚词，到虚词性的惯用词组、固定格式都有专门注解。如伊藤东涯《用字格》专门研究虚词的搭配顺序，其《助字考》研究虚词性的惯用词组，东堂弘《助辞新译》则专门研究虚词性固定格式的用法，可见这一时期的汉语研究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

其二，研究方法合理。重视文献用例，重视专书、专题研究。通过对大量语例的分析，从中对比总结汉语词语的意义特征和使用规律，如伊藤东涯《用字格》为探讨语序问题整理出了三百余条例句；皆川淇园的三部《助字法》中，单个词条下例句最多的达30余条。展开专书、专题研究，材料更为集中，讨论容易深入，如皆川淇园分别针对《史记》《左传》《诗经》三种书的虚词进行研究，写成三书的《助字法》；大典禅师按照文献的体裁、时代之别，写成《诗语解》、《诗家推敲》和《文语解》。重视研究角度，重视借鉴已有成果。站在不同的角度，会观察到研究对象不同的特点，如伊藤东涯擅长运用汉日语言对比，大典禅师注重词语使用的时代性、词语间的搭配习惯等，得出的一些结论也都颇有见地。继承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江户学者善于借鉴已有成果，特别是我国古代注释书、字书、韵书等，如三好似山《广益助语辞集例》主要是对注释书、字书、韵书中的虚词释义进行整理总结，荻生徂徕解释词语用法有很多自己的见解，但在各词条下总是先列出前代的注释成果。江户时代学者之间也注意相互借鉴，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等人的成果都成为后期学者研究

的基础，如宇野明霞推崇获生之学，大典禅师继承宇野明霞的学问，皆川淇园受到宇野明霞的影响也很明显，三宅橘园继承了皆川淇园的研究理念等。从内容上看，获生徂徕提出的词类观一直影响到江户末期，大典禅师在研究中区别文献体裁正是源自他的老师宇野明霞的观点，东堂弘《助辞新译》则与伊藤东涯的《助字考》多有相通之处。

其三，出现朴素的理论意识。江户时代的获生徂徕和伊藤东涯是最先对虚、实词的界定和词类的划分提出明确说法的，他们继承了我国旧注以及诗论、文论中有关“实字、虚字”“静字、动字”“助字”等名称，加以融通，进而阐述汉语字、词、句的构成以及词类问题，这里体现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对研究意义的本土化追求。获生徂徕在《译文筌蹄》卷首提出了“字义、文理、句法、文势”说，并指出对汉文写作而言，应该先理解“字义”形成唐人之词，再通晓“文理”以掌握用词先后的规律，最后考虑文章整体“文势”。这是对汉语从字义到文章构成的整体认识。在“字义”的问题上又进一步提出“字品”说，即词类。除了“体字、用字”区别不明之外，整体层级划分和现代语法学的划分在本质上已经很接近。获生徂徕的这种“实字、虚字、助字”三分法一直为其后的学者所沿用，给江户时代中后期的文言词语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伊藤东涯在《操觚字诀·字例》中也提出了明确的词类观，他以“实字、虚字、助字、语辞”四分汉语词类。在对词类系统性和层次性的把握上不如获生徂徕，但他以“助字”和“语辞”对虚词的下位做出了划分。同一时期，我国清代学者的虚词研究也体现了他们的词类观，各种训诂考据著作中也蕴含着句法、词类的观念，不过尚未建立词类系统。江户学者出于对外语学习的需要，把性质相同的词语归到一起以提高学习效率，这种动力促使他们对汉语词类进行系统划分，找到在整个汉语词类系统中的位置后再逐类进行研究。

其四，研究具有实用价值。汉语文言的研究者多是当时的名儒大家，他们中的多数人一边研习学问，一边开办私塾，教授弟子门生学习汉语进而辅助读经写作。不管是为了研读经传，还是为了辅助作文写诗，实用是他们的目的。为了便于初学者学习，在内容和行文上都颇费心思，例如一些著作为了区分例句的出处、突出例句中的待释词专门加上“○”“△”等符号，三宅橘园《助语审象》为利于记忆，还将虚词编成了四字押韵的歌诀等。唐话教本作为汉语口语教材其实用性更为突出。编写上都标有注音及日语译文，方便学习者理解和记忆。收录的词语短句内容生动，难易适度、层层递进，涵盖面广泛。有关礼貌、天气、筵席、读书、生意、嫁娶等话题尽在其中。安排的内容多与日常交际场景有关，学习者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锻炼实用的口语交际能力。教本中收录的众多长短杂话，大多是明清时的俗语、客套话等，一些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语句。学习者依靠朗读和背诵，掌握这些对话、短句，在生活中应用，使教材的内容转化为汉语交际能力。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经由汉语研究的层面可以考察日本一个时代的学者文人获取中国大陆文化的内容。汉语研究是人们不断地揭示汉语特点的过程，江户时代的文人僧侣注意到了汉语口语、文言的特点、注重汉日语言的比较，见证着人们从外语视角对汉语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对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的汉语研究著作进行考察与分析，而这也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001

第一节 江户时代汉语研究概述 / 00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007

第三节 文献选取及研究方法 / 010

第二章 汉语白话研究 / 016

第一节 赴日黄檗宗禅师对汉语白话传播的影响 / 016

第二节 唐通事的设置与唐话学的兴起 / 018

第三节 冈岛冠山与唐话教本 / 022

第四节 唐话教本编写特点 / 031

第五节 唐话教本中体现的教学原则 / 036

第六节 唐话教本中体现的对汉语特点的认识 / 043

第七节 小结 / 046

第三章 汉语俗语俗字整理 / 049

第四章 汉语文言研究的发生期

——江户前期对《助语辞》的研究 / 056

第一节 《助语辞》的传入与汉语文言虚词研究的产生 / 057

第二节 毛利贞斋《重订冠解助语辞》对《助语辞》的注释 / 059

第三节 三好似山《广益助语辞集例》对《助语辞》的增广 / 072

第四节 松井河乐《语助译辞》对《助语辞》的翻译 / 081

第五节 小结 / 085

第五章 汉语文言研究的鼎盛期

——江户中期对古汉语虚词的专门研究 / 087

第一节 荻生徂徕的古汉语虚词研究 / 087

第二节 伊藤东涯的古汉语虚词研究 / 113

第三节 皆川淇园的古汉语虚词研究 / 138

第四节 大典禅师的古汉语虚词研究 / 151

第五节 小结 / 166

第六章 汉语文言研究的衰落期

——江户后期古汉语虚词研究余波 / 170

第一节 河北景桢《助辞鹄》的收词、体例与释义方法 / 170

第二节 三宅橘园《助语审象》的收词、体例与释义方法 / 180

第三节 释介石《助字櫟》的收词、体例与释义方法 / 189

第四节 东堂弘《助辞新译》的收词、体例与释义方法 / 195

第五节 小结 / 207

结 语 / 210

参考文献 / 212

后 记 / 21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江户时代汉语研究概述

据学界考证，早在春秋末期至秦汉之际，江南一带的吴人和越人就已经开始越海东徙，他们乘坐舟楫借助季风或暖流漂抵九州一带的概率颇大^①。到了汉魏，中日之间的交流不只有海上的民间通道，还有经由朝鲜半岛的官方通道。稻作、桑蚕、汉医、佛教等文化随着民族的交往广泛传入日本。由于大陆文化带来的重要影响，古代日本以社会上层的皇室贵族为主尊崇汉学，学者文人研习汉学成为社会风尚。据《日本书纪》卷十记载：“（应神）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乃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

^① 王勇主编《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的源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第4页。

是书首之始祖也。”^①（《日本书纪》原文无标点，为便于阅读本书添加标点）如书中所记，公元285年百济王仁赴日传授太子汉文知识。对此，有研究曾指出：王仁在日本教授菟道稚郎子学习的中国典籍不仅有《论语》，还有《诗》《书》《易》《礼》《春秋》^②。到圣德太子（574~622）时，他先后向高句丽僧惠慈学习佛学、向博士觉智学习儒学，用佛学和儒学的思想来推行国家改革和文化立国的政策，并从公元600年开始派出使节，由留学生、学问僧随行，促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公元8世纪的奈良王朝时期，律令政治顺利推行，儒教政治逐渐在佛教精神的影响下转向佛教政治，学问也随之形成学习佛教的“内典之学”和学习佛书以外汉籍的“外典之学”。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无论是法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还是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都要通过汉籍这个途径来获取，这是接触其他学问的前提。想要熟悉汉籍必须先认识汉字、通晓汉文，日本的贵族、僧侣和学者曾一直采用文言来解读经传和诗文，直到14世纪创造出“训读法”。对于不能直接以汉语文言来阅读汉籍的日本人来说，“训读法”逐渐成为“目读”汉籍的一个捷径。

17世纪初期，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日本社会进入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维护政权开始推行“禁教”“锁国”的政策。由于信奉新教的荷兰人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传教名义下的殖民扩张行为引起了幕府的警觉，原本为了对外贸易而被默认在日本传播的天主教于1612年开始被禁止。禁教的同时，德川幕府还逐渐采取禁止私自进行对外贸易的锁国政策。在幕府成立之初，为了保证幕府政权的权威性以及获取对外贸易的巨额利润，幕府曾一直积极地与明

① [日]八木壮一主编《宫内厅书陵部影印集成2·日本书纪二》，东京：八木书店，2006，第160~161页。

② 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93页。

朝取得联系，允许各藩大名、商人进行海外贸易。但是随着禁教政策的实施，幕府逐渐垄断对外贸易、增强限制措施。从1624年开始禁止西班牙商船到日本，1635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到海外，海外日本人禁止回国。1639年禁止葡萄牙商船到日本，还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迁到长崎的人工小岛，禁止与日本人自由交往，从而形成德川幕府“锁国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下，仅留下四个窗口进行对外交往：通过长崎的荷兰商人及中国商人进行对外贸易；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外交往来与贸易；通过萨摩藩与琉球进行人员往来和商品贸易；通过松前藩与北海道的虾夷族进行交往。^①

幕府的锁国政策并不能完全阻断岛国和外界的联系，而且在利润的驱使下还进一步激发了大名、商人的贸易欲求。在长崎，荷兰商人仍可将生丝、毛纺织品、棉纺织品、药品、钟表、书籍带到日本，将日本的银、铜器贩卖到欧洲。荷兰商船还向幕府提供有关介绍海外风土人情的“荷兰风见书”。而德川幕府和清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更加广泛和持久。可以说，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影响。当时的清船输入日本的物品包括茶叶、糖、稻米、香料、丝织品、字画、书籍、瓷器、漆器、药物等丰富齐全的品类。在这当中，书籍的输入量非常之大。在1685年到1714年日清贸易高潮期间，每年的赴日清船为五十只到八十只，持续了三十年。^②有赖于商船的持续往来，当时的日本社会依托由长崎口岸传入的物品、书籍、宗教文化等，拥有了刺激学术发展的外部条件，屏退了外来武力的干扰。尽管锁国政策保守退步，却为德川幕府政权提供了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整个17世纪，日本的社会经济得到

① 严绍疆：《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第291页。

② 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第193页。

迅速发展，手工业兴盛、交通发达、城市数量增加、农业生产有了进步。在这样相对和平富庶的环境里，加上地方私学、出版印刷、抄本书籍等各方面的稳步发展，学问不再是王室贵族的特权，开始向一般大众普及，庶民教育发展到江户时代终于得以兴起。而通过仅存的对外口岸传入的汉语书籍在当时更是备受关注，汉语学习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汉语白话、俗语俗字、书面文言，江户时代的学者都进行了专门探讨。

在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下，唯独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能够在特殊条件下继续展开对日贸易，长崎口岸会聚着众多的中国商人。同时，正值明朝灭亡，不断有从大陆迁徙到日本的侨民在长崎上岸。在这样的局面下，为两国人交流和沟通提供服务的、专门的翻译人员便必不可少。“唐通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产生的。江户时代以前，也有少数的人从事类似的翻译工作，他们曾被称作“日佐”“吉师”等，但翻译还没有成为专门性的职业。自宽永年间（1624～1643）开始设置经过专门的汉语白话养成的翻译人员以来，日汉通译逐渐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职业。《长崎通航一览》一书就记载着，日本宽文六年（1666）曾任命“通事”一百六十余人（包括荷兰语翻译）。唐通事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结构大致如下：^①

唐方诸立合（海关官员）二人	同助一人
唐通事目付（汉语总翻译）二人	
唐大通事五人	
唐小通事十四人	内助一人
唐小通事并十一人	同末席十人

^① 严绍盪：《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第292页。

唐稽古通事三十人

唐内通事三人

作为唐通事的对译语言不少是中国的方言，所以在各级通事内部，还细分为“南京口”“漳州口”“福州口”等。早期的唐通事主要由迁居日本的中国侨民来担任。在明末的战乱纷争中，避居长崎等地的中国人家有三十余户。其中，冯六是唐通事的始祖。后来刘一水、陈严正、郑干辅等人也都成为非常有名的唐通事。早期的日本人“通事”也有不少是华裔的后代。《先哲丛谈》《诸家人物志》等日本文献对此都有记载。如深见玄岱是中国漳郡人高寿觉的孙子；庄左卫门和元右卫门是中国范阳人卢君玉的儿子和曾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担任唐通事，到17世纪中叶，据说已有将近一百七十人。日本人担任唐通事一般要从幼年时候开始，进行汉语白话的会话训练，从小养成汉语会话能力，到了十五六岁就可以担任“稽古通事”。长崎的开放使它成为日本唯一吸收新知的窗口，全国各地憧憬知识的学者文人游学于此，从而使最初由长崎发达起来的“唐话学”在学者文人之间迅速流行开来。唐通事冈岛冠山（1674~1728）为适应学习汉语需求的增加，编写并出版了关于中国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白话教材。在京都、大阪、尾张、名古屋和江户等主要城市，学习“唐话”出现了高潮。最初是贸易交往促使“唐通事”这一职业的诞生，继而又推动“唐话”学习成为社会的热潮。然而，这并不是掀起“唐话”学习热潮的唯一原因，赴日的黄檗宗僧徒同样对汉语白话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中日佛学交流达到了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德川幕府的统治需要以及旅居长崎等地华侨的邀请，时年64岁的汉地高僧隐元隆琦于1651年率领徒众数十人渡海弘法，创办了日本禅宗新兴宗派——黄檗宗。黄檗宗建立以后，不断从大陆招请僧人前来担任住

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创造了唐朝僧侣东渡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隐元东渡后，黄檗宗僧徒用汉语诵经、做法事，沿用汉地风俗布置道场，用汉语白话与日本人往来交流，这些都对汉语白话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日本，汉语白话学习成为风尚，文言著作也并未被冷落，正统文人依然要依靠文献典籍训练汉学修养。江户初年，元代卢以纬所著虚词蒙学教材《助语辞》一书传入日本，在儒学者中引起关注。毛利贞斋最先用传统的古书注解方法对《助语辞》进行解读注释，此后，从江户初期的大儒荻生徂徕、伊藤东涯，直到江户末期僻居地方的学术耆老都曾参与到汉语虚词的研究中，他们依循《助语辞》的体例展开专门的汉语虚词研究，撰写了近百部教材。这些著作当中，有为传授初学而写的蒙学书，有为门下弟子讲授用的教材，有门生整理出来的课堂讲义，其中也有一些学术性较强，虚词研究持续到江户末年。

对贸易利润的追逐、外来文化的刺激，都使汉语汉籍备受推崇。和平繁盛的社会缔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在清代出版业的影响下，地方各藩纷纷招聘学者从事出版事业，为学术研究营造出版环境。江户时代之前不具备这样的外部条件，而在江户之后日本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在战争政策的主导之下，明治至昭和年间的汉语研究主要服务于军事统治。可以说，在古代日本社会，只有江户时代出现了同时关注汉语口语白话和书面文言的情况，并且产生了许多研究专著。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经由汉语研究的层面可以去考察日本一个时代的学者文人获取大陆文化的内容。汉语研究是人们不断地去揭示汉语特点的过程，江户时代的文人僧侣注意到了汉语口语、文言的特点，注重汉和语言的比较，留给后世大量的汉语研究著作，见证着人们从外语视角对汉语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二节 研究现状

关于江户时代汉语白话研究这一问题，石崎又造曾从俗语文学和唐话教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展开过探讨，指出唐话教本的编纂者冈岛冠山是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日语的学者之一。除《水浒传》之外，冈岛冠山还编译了《通俗皇明英烈传》、《太平记演义》和《明清军谈国姓爷忠义传》等多部小说，也正是这一经历，使他日后的唐话教本编写多有选材自俗语文学的内容。而他的教本不断得到当时学习人士的认可，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明清俗语小说在日本的传播^①。后来经过六角恒广的整理，江户时代唐话教本的原貌得以集中呈现，这就是由日本不二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补集”之《江户时代唐话篇》。此后，中日学者主要针对这套教材展开专题、专书研究。奥村佳代子指出，从《唐话纂要》、《唐话便用》和《唐话译览》中可以看到人称代词“我”“你”“他”，复数形式的词尾“们”“每”“等”是共存的^②。

唐话研究的成果集中收录在鲁宝元主编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当中。此书收14篇文章，共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唐话教本的研究价值。鲁宝元《唐话五种教本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朱勇《日本江户时代唐话教本的研究价

① 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お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東京：清水弘文堂書房，1967，第417～421页。

② 鲁宝元主编《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第61页。